

学林

← (上接7版)

知识体系, 体贴入微地理解研究对象的具体表述。理论则是从研究者的知识体系出发, 将其一般性的认识适用于特殊的研究对象, 从而达成理解。

中国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 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理论与语文学的斗争。

今文经学用“大一统”、“天人合一”以及阴阳五行等理论来解释经文本中所谓“微言大义”, 其实质是用当前理论对古代文本进行过度阐释。

古文经学因为其文本所用文字古奥, 所以首先要“重训诂”, 从经典文本语言文字在古代的本来含义出发来解释经文, 也就是语文学的方法。

与中国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差可比拟的是, 西方学术史上有所谓寓意阐释(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和字面义阐释(literal interpretation)的对立。

寓意阐释, 亦见于在对西方古典文本的解释, 但最典型的, 集中表现在对《圣经》文本的解释中。在《圣经》解释的历史上, 寓意解经曾盛行一时。解经者在经文字面意义之外, 根据后世“预表论”等神学理论, 阐发、构建其深层的寓意。这“寓意”与中国今文经学所谓“微言大义”差可比拟。

用理论阐发出来的“经义”, 在中国和西方往往都发挥着指导生活的现实功用。汉代董仲舒主张以儒家经义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 称作“经义决狱”。基督教以《圣经》作为指导信徒生活的最高准则, 也曾致力于阐释经文字面意义之外的神学意义, 以扩大生活指导的覆盖面。

对于古代文本的解读诠释, 中国和西方都曾上演过“回归语文学”的故事。

《圣经》文本有些地方存在寓意, 可以从寓意角度加以阐释。历史上寓意解经的问题是无限扩大适用范围, 从某种理论出发, 生搬硬套, 牵强附会。随着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 寓意解经已经淡出, 字面义阐释恢复了主导地位。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讨论明清之际的学术转向: 不再从“宋代新儒学力图建立的涵盖全部人类经验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古典, 而是通过“训诂考证”“还原古典原义”(21页)。所转向的这个philology(语文学), 清初亦称“汉学”(江藩《汉学师承记》)。从宋学到汉学, 显而易见, 在朴学家看来, 这个“语文学转向(turn)”是一种“回归(return)”。

(5)

1983年, 研究近现代文学的美国文学批评家保罗·德曼(1919—1983)也喊出了“回归语文学”的响亮口号, 影响颇广。

面对近现代文本, 没有时空隔阂, 一般说来没有“通训诂”的必要, 也就没有多少语文学的用武之地, 应该是文学理论的一统天下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文学批评需要根据在人类经验和历史的宏大背景下形成的关于文学的总体认识, 来评鉴具体作品的优劣得失。这关于文学的总体认识, 是形形色色的理论, 比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等等, 你方唱罢我登场。

理论是一副眼镜, 能让批评者从文本中看出特别的意义。但这眼镜是有色的, 批评者在文本中所看到的东西, 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来自文本, 何种程度上来自眼镜, 终究难免让人有所犹疑。

有鉴于此, 耶鲁大学解构主义学派的保罗·德曼撰有一篇颇为著名的文章, 题为《对理论的抵抗》。这个题目后来成为德曼相关论文集的书名。书中有一篇题曰《回归语文学》: 在宣布抵抗的同时, 指出了突围的方向。

德曼认为, 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应该从历史学和美学出发, 而是应该从语言学出发; 研究者首先要讨论的, 不是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而是这意义和价值具体是如何从文本中产生的、又是如何被接受的。只有做到这样, 才真正称得上是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 can be said to come into being)。

德曼提出的这个从语言学出发的理论, 与此前的理论有本质不同。用德曼在《回归语文学》一文中的话来说: “此番走向理论, 是回归语文学。(the turn to theory is a return to philology)”只有从理论与语文学相对立的格局出发, 才能准确理解这一句的吊诡之处。而这“回归语文学”的“理论”, 骨子里仍然是“对理论的抵抗”。

德曼所回归的“语文学”其实是语言学, 准确来讲, 是语法学和修辞学。不过为了点题, 德曼宁愿用古意盎然的“三科(trivium)”——即“七艺”中的文法、逻辑、修辞——来概括, 同时将逻辑归入文法, 故名三而实二。语法(包括词义)分析相对简单; 构成难点的, 是所谓“修辞解读”。德曼说: “修辞解读, 对于它们所鼓吹的解读, 同样



萨义德(左)和德曼(右)都主张“回归语文学”, 但是他们对“语文学”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果说德曼的“回归语文学”, 是对文学理论的抵抗, 那么萨义德的“回归语文学”, 可以说是对东方主义中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说到根本上, 这意识形态也是理论。

抱持着回避和抵抗的态度。这种对理论的抵抗无可克服, 因为这理论本身就是抵抗。”

德曼是文学理论家, 始终都是。其所谓“语文学”, 与传统语文学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 其“回归语文学”的主张, 仍然闪耀着语文学精神的光芒。

(6)

德曼《回归语文学》发表后二十年, 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发表了同题论文。

爱德华·萨义德, 美国阿拉伯裔文学理论家, 文学和文化批评家, 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的知识分子。萨义德因《东方主义》(1978)一书而蜚声学界。所谓“东方主义”(或译“东方学”), 是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对北非、中东和亚洲等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和认知。在萨义德看来, 这些研究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因而东方学的著作都有着浓厚的政治意味。

2003年, 在萨义德罹患癌症去世之前, 完成了《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 其中核心篇目之一就是《回归语文学》。从书名不难看出, 萨义德关于“回归语文学”的讨论与政治密切相关, 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一脉相承。

萨义德和德曼都主张“回归语文学”, 但是他们对“语文学”的理解并不一致。萨义德对德曼将文本从其生成历史中剥离出来仅从语言学上加以分析的做法进行了批判, 认为“语文学”是“对生活于历史之中的人的言语和修辞进行仔细、耐心的考察, 念兹在兹, 终身以之”。

如果说德曼的“回归语文学”, 是对文学理论的抵抗, 那

么萨义德的“回归语文学”, 可以说是对东方主义中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抵抗。说到根本上, 这意识形态也是理论。

人类学对于各种文化的研究有两个基本观点: 一个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聚焦于各种文化的相同点; 另一个是相对主义(Relativism), 聚焦于各种文化的不同点。

研究其他文化, 如果从普遍主义出发, 就是将研究者的一般性认识适用于特殊对象, 也就是通过理论来了解他者。而这理论, 必然是以自身文化作为标准和中心, 藉以想象和概括其他文化。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论语·八佾》: “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 乃基于华夏中心论; 萨义德所揭示的当代西方的“东方主义”, 乃基于欧洲中心论。二者虽有中西古今之异, 但其内在逻辑无疑是一样的。

如果从相对主义出发, 首先是学习该“其他文化”的语言文字, 通过语文学来掌握对方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 最终达成全面的了解。简单来说, 相对主义的宗旨是: “认真地将他者当作他者, 而不是自我的一个异域风情的、低劣的、或者未达标准的版本。”(Foley, W.A.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p.175) 埃米尔·卡齐姆(Emere Kazim)去年发表了《萨义德的哲学遗产: 相对主义和积极抵抗》(“The Philosophical Legacy of Said: Relativism and Positive Resistance”, Maydan Politics & Society, Dec. 4. 2018)一文, 这个题目反映了“萨义德主义”(Saidism)的关键词。尽管卡齐姆的态度不无保留, 但是众多学者从相对主义的角度解读萨义德却是不争的事实。

德曼所做的, 是举着解构主义旗帜的文学批评; 萨义德所做的, 是举着相对主义旗帜

的文化批评, 其间的差异显而易见。然而他们都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发表题为“回归语文学”的文章。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 与语文学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就像许多直奔主题而又不及细说的绝笔文章一样, 这两篇同题文章留下了不小的讨论空间, 吸引着许多人撰文讨论。我们认为, 他们之所以可以共用一个题目, 其共同之处在于, 他们都是对理论的抵抗, 都是对先入之见的警惕, 坚持从语言文字出发, 对研究对象的独特之处进行深入细致的体认。

(7)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2008年北京举办的国际藏学研讨会开幕式上, 施泰因克尔纳做了题为《我们能从语文学学些什么》的主题演讲, 他没有讲文本考证, 而是“大谈语文学方法对于实现人类和平、和谐和幸福的意义”。乍一看, 这颇令人意外; 但细一想, 这不仅合情合理, 甚至可以说极为应景切题。

德曼的“语文学”和萨义德的“语文学”畛域攸分。施泰因克尔纳显然是和萨义德站在一起的, 其语文学路径的上空, 飘扬着相对主义的旗帜。

藏学文献固然有许多是古代文本, 但在西方学者看来, 它们首先是来自其他文化的文本。欧洲无疑是当前具有较高威望的优势文化, 作者自觉地排斥欧洲中心主义, 抵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坚持从语言文字出发对藏学文献进行深入细致的体认, 就是认真地将西藏当作西藏, 而不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异域风情的、低劣的、或者未达标准的版本, 从而达到对东方的真正理解。这当然可以说具有“实现人类和平、和谐和幸福的意义”。尤其是发言地点是在北京, 听众主要是东方学者, 西方学者从这个角度揭示语文学的意义, 可谓即景生情, 着手成春。

(8)

理论聚焦于共性, 语文学聚集于个性。两者互相对立, 而又彼此相联。

西方近代学术史上, 理论家与语文学家曾经互嘲互谑, 其核心梗, 是将学问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度和适用性, 比作男女之间的浪漫约会。理论从普遍主义出发, 聚焦于共性,